

1521-1522年兩次中葡之戰史實考辨

張廷茂*

1513-1520年間，葡萄牙人先後進行了四次對華商業航行，葡萄牙使團也獲准進京。1521年（正德十六年）年初，一些官員開始就葡萄牙人在廣東的不法活動以及侵吞滿刺加的暴行提出指控；滿刺加使臣也來到京城揭露葡萄牙人的罪行，並請求朝廷派兵幫助收復國土；在京的葡萄牙使團因信函上的差異而陷於尷尬境地，其合法性和真實性受到質疑；使團一行在京城橫行霸道，驕橫跋扈，引起朝臣的普遍痛恨。於是，中葡關係發生逆轉，而武宗的突然去世，則加速了中葡關係的徹底破裂，該年3月24日，武宗突然病亡後即傳下遺旨：“……佛朗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¹⁾世宗即位後，江彬垮臺，皮雷斯失去靠山，火者亞三被誅，朝廷遂下令“絕其朝貢”，將使團逐回廣州，令廣州官員將他關押起來，直到滿刺加和印度的葡萄牙當局把滿刺加歸還原國王才能予以釋放。⁽²⁾就在皮雷斯離京之後，廣東沿海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終於在1521-1522年發生了兩次中葡之間的武力衝突。

關於這兩次中葡之戰，在我國學者的有關論著中已多有述及。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其中的若干重要史實，似乎還存在些模糊的認識，甚至在最近發表的研究成果中，仍然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究其原因，主要是對原始文獻把握不到位。有鑒於此，本文將基於對中葡原始資料的分析，就兩次中葡之戰的若干史實進行考辨。未妥之處，尚祈讀者指教。

一

利的風暴非常及時地刮起，西芒將會死於饑餓。他利用這個時機，帶領三艘船逃跑了。⁽³⁾

對於中葡之間的首次武裝衝突，龍思泰有如下的記載：

1518年〔應為1519年——引者〕，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德·安德拉德帶領一艘大船和三艘中式帆船到達該港。他建立了一座堡壘。在完工時僭稱對此地擁有主權。他擅自判處一名水手死刑，並當場行刑。這一公開的敵對行為，加之拒絕撤離該島，使他惡貫滿盈。一隊中國士兵圍攻這座堡壘。如果不是一次極為有

龍思泰的這段文字有兩處明顯的誤記。其一，參加此次戰役的葡萄牙人不是西芒·德·安德拉德一行，而是在他離開中國前夕來到中國的另一批葡萄牙人。

1521年4-5月間，以唐·努諾·曼努埃爾·阿爾莫塔塞爾（D. Nuno Manuel Almotacer）為船隊總指揮的一艘船從葡萄牙王國來到屯門港，船長是迪奧戈·卡爾沃（Diogo Calvo）。與他同行的還有幾艘從滿刺加出發的船和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的船。中國政府下令：皇帝去世時，任何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外國人都必須離開陸地，也不能在任何港口停留，違者處死。迪奧戈·卡爾沃和若熱·阿爾瓦雷斯等人不願意服從這一命令，理由是他們的買賣尚未做完。之後，中國官府拘捕了迪奧戈·卡爾沃的兄弟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lvo）和其他一些與他們一道停留在廣州的人。到達那裡（指屯門海澳）的兩艘船也被捕獲（其中一艘來自暹羅，另一艘來自北大年），船上的葡萄牙人中有一些人死於一次進攻、另一些人則被送進了監獄。⁽⁴⁾接狹，中國軍隊對停泊在屯門澳的葡萄牙商船實施圍攻，中葡之戰就此開始。

其二，此次戰爭進行的地點不在上川島。根據中葡史料的一致記載，此次戰爭發生在地屬東莞縣界、靠近南頭陸地的屯門海澳。這個問題將在本文第三部分討論。

二

1521年的第一次中葡之戰，不見於《明實錄》和《明史》等官方史書，祇能求索於為數不多的幾部私人著述。其中，記載最詳者當屬嘉靖年間陳文輔所撰〈都憲汪公遺愛祠記〉和萬曆初年嚴從簡所著《殊域周咨錄》卷九〈佛郎機傳〉。前者曰：

近於正德改元，忽有不隸數惡彝，號為佛朗機者，與諸狡猾，湊離屯門、葵涌等處海澳，設立營寨，大造火銃為攻戰具，佔據海島，殺人搶船，勢甚猖獗，虎視海隅，志在吞併。……事聞於公〔即汪鉉〕，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親臨敵所，冒犯矢石，劬勞萬狀。至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召募海州，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諸番舶大而難動，欲舉必賴風帆。時南風急甚，公命刷賊敝舟，多載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風縱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眾鼓噪而登，遂大勝之，無孑遺。⁽⁵⁾

後者稱：

佛朗機……其舶住廣州澳口。布政使吳廷舉聞於朝，尋檢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泊東莞南頭，蓋屋樹柵，恃火銃以自固。

命撫按檄備倭官軍逐餘黨醜類歸去。海道憲帥汪鉉率兵至。首據險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泅者鑿沉其舟，乃悉擒之。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⁶⁾

這兩段中文材料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同之處。就戰爭的進程而言，前者較後者為略，主要突出汪鉉個人的貢獻。而就明軍的作戰方法而言，前者主要強調了“因風縱火”，後者除指出“使善泅者鑿沉其舟”外，還詳述了佛朗機銃的運用。這一點可從汪鉉本人的〈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一疏中得到證實：“臣舉兵驅逐佛朗機，賴用此銃取捷。”⁽⁷⁾至於明軍的最終戰果，看來兩個文件的記載均有所誇大。

由於中葡文獻記載的詳略和側重點均有較大差異，現在已無法重建這次戰爭的整個過程，不過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共同之處。比照葡萄牙文獻的記載，嚴從簡的記載比較平實客觀。按照他的記載，第一次中葡之戰明顯地經歷了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基本戰況是雙方互有勝負。葡萄牙人以其火銃精良，據險逆戰，使明軍遭受損失。這可從葡萄牙文獻的記載中獲得印證：

廣州的大吏和官員們……以其全力捕獲那艘船和另外七、八艘停泊在那裡（屯門港）的葡船。為此，他們組織了一支有多艘船組成的艦隊，幾乎把我們包圍起來。在我們處於危險和艱難之時，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乘坐他的一艘裝備精良的船於1521年6月27日抵達，還有另一艘滿刺加居民的船一同到達。海道一得知這兩艘船進港，就把艦隊擴大為五十艘，而我們祇有五艘。他們很快就向我們發動攻擊。但是，他們也被我們的炮擊傷，死了許多人。於是，他們很少再進攻，祇

是就近將我們包圍起來。由於地方太狹窄，對我們的五艘船更有利，（因為）他們的船太多，但主要是因為我們擁有最好的炮。戰燄進行了四十天後，安布羅西奧·多·雷戈（Ambrósio do Rego）率領一艘船和另一艘滿刺加居民的船突然到來，他們沒有被海道的艦隊發現，因為在他們進入港口的時候，海道正在一個離我們停泊的地方三里格外的小海灣掩埋一些在三天前的一場戰燄中喪生的死者的屍體。^{（8）}

在後期階段，明軍以圍攻為重點，並採取因風縱火、水下鑿船等作戰方法，特別是倣造佛朗機銃成功後採用銃轟法，使戰況發生根本扭轉。對於後期階段，葡文文獻記載頗詳：

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 Álvares）已經去世。由於一些人喪生，另一些人在那次戰燄開始時被捕，其船上的人所剩不多；仍然停泊在那裡的其他船每船所剩的人都不超過八人，其餘的人都是駕駛商船的奴僕。於是，他們下令剩下的所有人分乘三艘船，準備在夜晚突圍。但是，由於海道已經密切注視他們，第二天一早，就向他們發起進攻，戰鬥場面就好像是籠罩在焰火下的一座地獄。……這次進攻是在1521年9月8日，……來了一場大雷雨，促使中國軍隊潰散，而且還造成了一定的損失。結果，杜阿爾特·科埃略及其同伴於1521年10月底到達滿刺加。^{（9）}

這次戰役是中葡關係史上的一次重要戰役。中葡兩國在首次相遇之後，雙方的關係漸由商貿層面上昇到外交政治層面，進而發展到武裝衝突，最終以葡人被逐而告結束。此外，此次戰役在中葡軍事科學技術的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作用。佛朗機銃在此次戰役中顯示出它的威力。此次戰役引發了引進西洋火器的過程，對我國的軍事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

此次中葡之戰，還有一個重要而有趣的問題值得探討，那就是戰役進行的地點問題。在此一問題上，中葡文獻的記載頗為僭合。前引陳文輔所撰

〈都憲汪公遺愛祠記〉和嚴從簡所著《殊域周咨錄》明確告訴我們，此次戰役確實發生在東莞縣界、南頭附近的屯門海澳。此外，本次戰爭的明軍統帥汪鉉本人也為我們留下了更加直接、更加可靠的證據。他曾欣逢同鄉長者吳媛、鄭志銳，與他們“劃攻屯門彝之策”，並為此賦詩一首。^{（10）}清代文獻對此次中葡之戰的記載雖不如明代文獻那樣詳細，但是，對事發地點的記載與明代文獻是一致的。^{（11）}

總之，對於第一次中葡之戰發生的地點，明清時代的中國史料記載是明確的、一致的：即屬東莞縣界、地處南頭附近的屯門海澳。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重要的事實，因為，它為我們提供了判別中葡關係開創階段葡萄牙人在華活動地點的最直接、最有說服力的依據。

現在我們來看葡萄牙文獻對此次戰役發生地點的記載：

1521年5-6月間，當迪奧戈·卡爾沃的船準備從貿易島離開時，遇到了災難……那些停泊在貿易島的船全都被俘獲，南頭備倭等官員沒收了船上的大部分貨物，倖存者登上了前來救援的迪奧戈·卡爾沃的“馬達萊那”號大船。^{（12）}

在貿易島，四艘滿載胡椒、檀香木和其他貴重商品的葡萄牙船被俘獲；從那些船上逃出的葡萄牙人靠游水或用小船，登上了唐·努諾·曼努埃爾的“馬德奈拉”號（Madanela）大船，它正載貨物停在港口，其船長是迪奧戈·卡爾沃。^{（13）}

可見，當時的葡萄牙文獻也一致記載，第一次中葡之戰發生在Tamou港或Tamou島，即他們所稱的貿易島。於是我們看到，正是在第一次中葡武裝衝突中，葡萄牙文獻中的Tamou與中國文獻中的屯門海澳在對音、地望和史實三個方面達到了一致。

就1521年的第一次中葡之戰而言，葡萄牙文獻中的Tamão就是中文史料中的屯門，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那麼，此一Tamão與葡萄牙人前幾次來華泊船之處Tamão有甚麼關係呢？湯開建先生認為：

Tamão一詞在葡文史料中所表示的是一個中國地名，但在中文之中所應表示的原始意義

卻應有二：一是大澳，一是屯門，其譯音均為Tamão。巴洛斯《亞細亞》一書中記載了四次葡人使團到達Tamão，前三次即1514年的Jorge Alvares、1517年的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及1518年的Simão de Andrade，這三人所到之Tamão，均是指上川島西北之大澳。1520年Simão未能進廣州，1521年葡人使臣Diego Calvo第四次來中國由於被中國政府拒絕而遭驅逐，均退泊Tamão，而這一Tamão，即是中國文獻中“東莞南頭”或“屯門”。最後在屯門葡人之間爆發一場戰爭，葡人被趕出屯門。⁽¹⁴⁾

為了說明葡萄牙文獻中的Tamão所表示的中文地名究竟是一個還是兩個，先讓我們來看下面一段文字：

就在我們處於危險和艱難之時，杜阿爾特·科埃略乘坐他的一艘裝備精良的船於1521年6月27日抵達，還有另一艘滿刺加居民的船一同到達。若熱·阿爾瓦雷斯是杜阿爾特·科埃略的老朋友，他已重病纏身，在科埃略到達十三天之後就去世了。他被埋葬在一個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柱旁邊；它是由這位若熱·阿爾瓦雷斯在拉菲爾·佩雷斯特雷羅抵達那裡前一年在那裡豎起的；在那一年，他到達那裡，曾把他的死去的一個兒子葬在了那裡。⁽¹⁵⁾

這是一段記載中葡屯門之戰的文字。葡萄牙編年史家的這段記載明確告訴我們，第一個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人若熱·阿爾瓦雷斯於1521年去世和埋葬的地方、1521年發生第一次中葡之戰的地方，正是他1513年首次到達中國時停泊和貿易的地方，他在那裡豎起了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紀念石柱的地方，他的一個兒子死後所葬的地方，拉菲爾·佩雷斯特雷羅來華所停泊和貿易的地方，即地處珠江口、屬東莞縣界、靠近南頭的屯門海澳。

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從滿刺加出航前往中國之前，曾在當地遇到了剛從中國返回那裡的拉菲爾·佩雷斯特雷羅。正是依據他所提供的有關對華航行和貿易的信息，費爾南·佩雷斯決定放棄向孟加拉航行的計劃，專事對華航行的準備。⁽¹⁶⁾ 16世紀的編年史對此次對華航行的

停泊地點和葡萄牙人在那裡的活動有詳細的記載。⁽¹⁷⁾ 根據這些記載可以斷言，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船隊停泊和貿易的地方，就是若熱·阿爾瓦雷斯和拉菲爾·佩雷斯特雷羅所停泊的地方。

再看下面的文字：

1519年8月，西芒·德·安德拉德率領的四艘船抵達中國，入泊他的兄弟曾經停泊的屯門島港口。正如我們已經叙述過的那樣，按照廣州城的命令不得再向裡走，所以他就在這裡進行他的貿易。⁽¹⁸⁾

1520年年中，迪奧戈·卡爾沃的船出現在屯門島，在此遇到了即將起錨前往印度的西芒·德·安德拉德。與他同時抵達的還有從滿刺加啟航的若熱·阿爾瓦雷斯的大船和另外幾艘船。⁽¹⁹⁾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葡關係最初十年間葡萄牙人在華泊船和貿易之地均在同一地方，即地處珠江口、屬東莞縣界、靠近南頭的屯門海澳；葡萄牙文獻中的Tamão所表示的中國地名始終是一個，而不是兩個。

四

對於第二次戰役，中國文獻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明世宗實錄》云：

嘉靖二年〔應為元年——引者〕佛朗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擒之。初，都盧恃其巨銃利兵，劫掠滿刺加諸國，橫行海外。至率其屬疏世利等千餘人駕舟五艘破巴西國，遂寇新會縣西草灣。備倭指揮柯榮、百戶王應恩率師截海禦之。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眾兵齊進，生擒別都盧、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俘被掠男婦十人，獲其二舟。餘賊米兒丁甫思滅兒等，復率三舟接戰，火焚先所獲舟，百戶王應恩死之，餘賊亦遁。⁽²⁰⁾

《明史·佛朗機傳》的記載基本一致，當是依據《明實錄》而來。⁽²¹⁾

與漢文資料相比，葡文史料的記載更為詳細，

對戰爭進程的記述也略有不同。根據葡文資料記載，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Martim Afonso de Mello Coutinho）率領的葡萄牙船隊首先入泊屯門，遭到明軍圍困後退出屯門⁽²²⁾，而中文史料中則沒有記載這一情況。不過，就本次戰爭過程中的主要情節而言，中葡文獻的記載大體上是相吻合的。

中文史料直述葡萄牙人寇新會縣西草灣，中國軍隊截海禦之。而葡文史料則稱，因遭到圍困，葡萄牙船隊撤出屯門港，轉向外面的大海灣，在那裡遭到中國軍隊的攻擊，並造成了一定的傷亡：

由於停在陸地近處太危險，就轉向港口外面，停在一個大海灣。在這裡，中國人用他們的艦隊將葡萄牙人包圍起來，向他們放炮，射箭。馬爾丁·阿豐索馬上派出兩條小船向（杜阿爾特·科埃略停泊的那個岬角）駛去。中國船向這些小船射箭並發射了多枚炮彈，結果，他們不得不帶挾兩名死者和一些傷員返回了大船。……馬爾丁·阿豐索指揮這些武裝的小船，並帶上全副武裝的人前去上淡水。中國人乘坐小船向他們發起進攻，形勢非常緊急，好不容易才帶挾重傷回到了幾艘大船上。⁽²³⁾

葡萄牙商船從屯門撤出而轉入的海灣，當即中文史料中的西草灣。查《蒼梧總督軍門志》〈全廣海圖〉，“西草灣”標在澳門半島之南、橫琴以東至三竈之間⁽²⁴⁾；而在《粵大記》〈廣東海圖〉中，則在澳門半島之南與十字門平行的地方標有“西草澳”⁽²⁵⁾。這樣，西草灣的地理位置，就與葡萄牙文獻所記葡船退出屯門、由珠江口以東向以西撤退的行動路線相吻合。

又據前引中文史料，由西草灣轉戰至稍州後，戰爭進入決戰階段，也是中國軍隊的決勝階段。對此，葡文資料亦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於是，大家簽定一個文件，決定撤離。第二天，他們展帆之後，中國人就開始接近他們，並向他們發炮射箭。就在這時，迪奧戈·德·梅洛（Diogo de Mello）船上的火藥桶起火，導致了根本無法撲滅的火災，造成大船破裂沉沒。佩德羅·奧門（Pedro Homen）看到許

多人掉入水裡，派他的小船前來搭救。可是，很快就有很多艘中國人的平底船向佩德羅·奧門靠近。中國人在大船上抓到了他，登上船的中國人很多，結果，除一人逃進了桅樓外，其他人全部喪命。在同一天夜晚，出發前往滿刺加。⁽²⁶⁾

除了揭示戰爭的主要結果與中文史料的記載相吻合之外，這些葡文資料還告訴我們，此次戰爭開始於屯門，葡萄牙人撤出屯門後由東而西向外洋一退再退，直至被擊敗逃回滿刺加。由此可見，所謂“葡人東來先到達上川島……在上川島遭到中國軍隊的驅趕，葡人遂撤離上川島繼續東進去廣州”⁽²⁷⁾的說法，是缺乏史料依據的。

五

對於此次中葡之戰，尚有一個問題需要探討：廣東政府是否與葡人進行議和？湯開建先生稱：“據 Ljungstedt 所言，當時的廣東大臣確曾與葡人協商，並提出了三項要求”，並引出 Ljungstedt 的文字：

1522年，葡人 Martin Afonso de Mello Coutinho 奉葡王之命，率艦三艘，東來與中國和好。廣東大吏要求三事：一、Simão de Andrade 須無反攻上川之意。二、禁葡人不得與中國人互有往來。三、葡人船隻禁載中國軍士。⁽²⁸⁾

經與原書對照發現，這段譯文有嚴重的誤差。正確的譯文應該是：

次年（1522），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Martin Afonso de Mello Coutinho）奉葡王之命，率六艘船前來與中國皇帝修好。在擊敗了 Simão de Andrade 對 San-shan 的蓄意進攻之後，該省政府不僅禁止中國人與葡萄牙人接觸，而且還發佈命令，要求中國艦隊一旦遇到掛葡萄牙旗的船即將其摧毀。⁽²⁹⁾

據此可知，Ljungstedt 並沒有說廣東大吏“確曾與葡人協商並提出三條要求”。

當時的葡文資料可進一步證實這一點。在遇到中國軍隊的進攻時，Martin Afonso de Mello

Coutinho確曾派舌人向中國官員表示了媾和的意願。但是，結果卻與他的願望完全相反：

中國人反而較前更多地射擊，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了皇帝關於禁止葡萄牙人在他的任何一個港口停留的命令。……他不再理睬那些口信，也不再談論和平，因為這一切都是徒勞的。⁽³⁰⁾

由於另外一些船隊總指揮在那個港口所造成的損害和災難，整個國家都在反對他們；皇帝下旨禁止他們在那裡停留，這就是船隊司令要與他們作戰的原因。⁽³¹⁾

中國人對他說，已經沒有任何和平可言，因為是皇帝命令這樣做的，一旦相遇就祇有戰爭；所以，他們必須離去，不得再逗留。⁽³²⁾

葡萄牙文獻的記載顯示，馬爾丁·阿豐索·德·梅洛·科蒂尼奧確有媾和意圖，但是，自始就遭到廣東官員的斷然拒絕，並且在軍事上遭受沉重打擊。所謂葡萄牙人在遭受打擊後還要“繼續東進去廣州，希望與廣東政府媾和”⁽³³⁾之說實為無稽之言。

【註】

- (1) 《明武宗實錄》卷一九七“正德十六年二月”，臺北，臺灣中文出版社縮印本，頁5。
- (2)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Livraria São Carlos, 1973-1974, vol.6, pp.12,13.
- (3)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p.5
- (4)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p.18,19.
- (5) 靳文謨：《新安縣志》卷12《藝文志》，廣州，中山圖書館1962年康熙戊辰（1688）版油印本，頁20。
- (6)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佛朗機》，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點校本，頁320、321、322。
- (7) 黃訓：《名臣經濟錄》卷43《兵部職方下》，四庫全書縮印本，頁2。
- (8)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p.20,21,22.
- (9)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p.22,23
- (10) 靳文謨：《新安縣志》卷12《藝文志》，頁50。
- (11) 史澄：《廣州府志》卷38，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五年刊本印行，頁107；郭文柄：《康熙東莞縣志》卷十四《外志一》，東莞市政府1994年影印本，頁681。
- (12) Rui Manuel Loureiro,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2, p.32
- (13)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Porto, Lello e Irmão-Editores, 1975, vol.2, p.678. 類似的記載又見於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Porto, Lello e Irmão, 1979, vol.1, p.134;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20.
- (14)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1-22。
- (15)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p.20-21.
- (16) Rui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 p.202
- (17) Fernão Lopez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vol.1, pp.915, 916;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5, p.185;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2, p.524.
- (18)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2.
- (19)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18; Rui Manuel Loureiro, *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 : 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 (1524?)*, p.32.
- (20) 《明世宗實錄》卷二十四“嘉靖二年三月”，臺北，臺灣中文出版社縮印本，頁8。
- (21)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佛朗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頁8431。
- (22)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vol. 2, p.176; João de Barros, *Ásia - Década III*, vol. 6, p.283;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 2, pp.718-719.
- (23)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 2, p.719. 類似的記載又見於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vol. 2, p.177-178; João de Barros, *Ásia - Década III*, vol. 6, p.285.
- (24) 應懷、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全廣海圖》，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中心影印本。
- (25) 郭棐：《粵大記》，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點校本，頁914。
- (26)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vol.2, p.178-179.類似的記載還見於João de Barros, *Ásia - Década III*, vol.6, p.285;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2, pp.719-720.
- (27)(28)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12。
- (29)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p.5.按：1992年版係根據1836年波士頓版重印，除改正幾處印刷錯誤外，內容一仍其舊。
- (30) 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1497-1549*, vol.2, p.177.
- (31) João de Barros, *Ásia-Década III*, vol.6, p.284.
- (32) 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Índia*, vol. 2, p.720.
- (33)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頁12。